

·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与价值

李 龙, 盛 鹏

(浙江大学 法律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哲学社会科学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事关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盛衰和高等教育的成败;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是立国、治国之本;哲学社会科学最能表征各民族鲜明的个性,体现一个民族的品格,是民族盛衰之学,是民族文明之魂;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体化是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来看,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比较优势,是建造世界一流大学之根基。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价值; 地位

[中图分类号] C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5)02 - 0097 - 06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日益关注,更加重视。2004年,党中央发布了“三号文件”,紧接着,中央办公厅又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同年4月,中央又召开专门工作会议,研究落实一系列重大部署,这次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会,是建国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盛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会见了大会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李长春同志作了长篇报告。该工程被称为党和国家的生命工程、第一工程。这次大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表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

一、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

中共中央2004年3号文件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哲学社会科学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品格,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盛衰均同哲学社会科学息息相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因为有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和指导而兴旺发达,也会因不重视甚至压制哲学社会科学而走向混乱和衰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是立国和治国之本。

其一,近现代国家发展史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先进思想及制度为近现代国家的形成与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西方,正是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潮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在欧美大陆相继成立;《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创立,为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前提条件;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帝国宪法”的颁布,为大和民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印度,“甘地主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印度赢得了国家独立;在中国,

[收稿日期] 2004 - 09 - 24

[本刊网址 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 李龙(1937 -),男,湖南祁阳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宪法学、法理学和高等教育研究; 2. 盛鹏(1972 -),男,安徽阜阳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宪法学和高等教育研究。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其二,哲学社会科学为国家提供了立国的理念和治国的方略。总体而言,民主共和国理念的提出,使人们摆脱了奴役的枷锁;法治方略和模式的构造,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弘扬,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责任政府、权力制约的论证,使人的异化得以控制,促使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使人的生存、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得到肯定、保障和救济。具体而论,在美国,罗斯福新政利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社会法学家的学说,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为打败法西斯提供了经济基础。在中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使我国人民摆脱了“左”的错误和个人迷信,邓小平理论使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富强道路,“一国两制”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的殖民统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指导中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奔向美好的未来。

其三,哲学社会科学同时还培养了大量治国人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首先要有治国之才和建国之才,哲学社会科学培养的就是治国之才。治国之才靠的是治国之学和治国之术,自然科学虽然也能提供一定的治国知识,但更须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来共同造就:哲学型精英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学指导英才们的政治行为,法学锻造英才们的公平正义理念,伦理学、文学培育英才们的道德情操,社会学、历史学则拓宽了英才们的视野。如此的治国之才才能保证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哲学社会科学是民族文明之魂

自然科学的特点在于求同,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断揭示某一领域的特殊现象,向着共同的科学顶峰攀登,科学无国界,它具有明显的工具性。而社会科学的特点在于求异,并在异中求同,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立足于国情,因此有着国别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铸造民族精神,追求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最能表征各民族鲜明的个性,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品格,它是关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明的学问,是民族盛衰之学、民族文明之魂。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为建构民族精神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营养。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1776年《独立宣言》的产生,使一个分裂的、不同的外来民族凝聚为一个共同的民族,诞生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利坚民族精神,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发达的议会制理论使英国成为近代法治的发源地,养成了英国人理智和审慎的传统风范。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为民族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心智支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励志格言唤起了中国人的公民责任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高度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千古绝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创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拿破仑的《民法典》则开辟了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并成为欧洲人的骄傲。

再次,哲学社会科学可以矫正民族文明发展中的道德失范行为。由于统治者个人品质和落后、反动的政治制度等因素,一个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如侵略战争、内乱、生活腐化等社会失范行为。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发挥其独有的社会批判功能,荡涤污浊,纠正民族文明发展中的不和谐行为,再铸民族文明之魂。二战后的德国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界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和反思,重铸理性和法治之鼎,很快又在国际社会找回了自信;中国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严厉批判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找到了新的驱动力,从而奏响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曲。

三、两类科学的相互依存是科学发展之路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知识的两大主干门类。自然科学是帮助人们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进行正确认识和把握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尽管这两门不同科学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原则区别,并且在自产生以来的漫长时期里,几乎处于严重的相互隔离、互相对立的割裂状态,但事实证明,只有在两类科学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它们才能共同繁荣和发展。

第一,科学发展史表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是不可分离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共同构成了科学的完整体系,只有两者相互配合和补充,科学的花园才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既需要自然科学,又需要社会科学。在古代,由于知识总量较少以及人们认识手段和能力的不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混沌不分地交融在一起。到了近代,随着实验自然科学的产生,自然科学从科学阵营中独立出来,社会科学也由此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逐步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内容和研究方法。从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开始分离,并沿着几乎不同的轨道各自演进和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虽然给两者提供了深入发展的条件,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也让人们认识到,如果任由两类科学继续分化和隔离,不仅对两类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完善无益,而且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重新出现,并日益增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互相融合,逐渐出现一体化的趋势。正如日本著名学者玉野井芳所说:“自然科学可称为‘自然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可称为‘社会的自然科学’。”^{[1](p.7)}

第二,从两者的价值对应性角度看,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互补互渗,各自都对对方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价值意义表现为:首先,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研究手段,不断提高社会科学研究效率和水平,从而影响社会科学的环境。其次,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方式,提升人类智能和脑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可以以此为中介,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革命性变化,促进社会的智能化,成为复兴人类文明的重要机制,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繁荣提供必要的条件^[2]。再者,自然科学影响社会科学的形态。社会科学的形态是受自然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的,自然科学技术的水平不但改变哲学的形态,而且也改变社会科学的形态。例如,以力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决定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也决定了以机械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社会科学的形态;注重研究过程和联系的科学决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态,也决定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科学的形态。但是,当我们在高度评价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价值意义的同时,也丝毫不能忽视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巨大作用。首先,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对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自然科学解决的是事实问题,是实然的真伪判断;而社会科学解决的是价值问题,是应然的价值判断。自然科学若离开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就可能偏离为人类谋福利的轨道。另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需要一定的方法论作指导,正确的方法论会使自然科学研究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提供这样的方法论,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其次,哲学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向生产力转化过程中起着“软件”的作用,能提高自然科学的转化效率。自然科学能否畅通无阻地转化为事实上的第一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科学所提供的转化机制和转化环境是否优良,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科学的进步”^{[3](p.353)}。再次,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分别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自然科学的发

展。因此,任何割裂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价值和功能上的联系的观点,在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已被证明是有害的。

第三,从两者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都是生产力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它们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邓小平同志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一般科学应包括社会科学的思想,不仅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而且还强调指出,“科学当然也包括社会科学”。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涵括着“自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哲学社会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双重意义。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应当承认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应当承认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发展史表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且发展缓慢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也发展迟缓;而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则又总是发生在哲学社会科学有了充分发展之后。建国以来的历史也一再证明,当我们真正重视并发展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生产力就会蓬勃发展;而当哲学社会科学受到抑制的时候,生产力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报复。

应当看到,社会发展到今天,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无论哪一门类都不可能单独承担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的任务,只有顺应科学与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给生产力发展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第四,从两者的结合之于科学家的作用而言,历史上许多自然科学大师之所以受人尊敬,不仅仅因其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更是因为有伟大的人格和良好的人文科学背景。在古代、近代科学史上,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是大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既是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又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既是两大科学综合的标志,又是其分离的开始;中世纪的神学家窒息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阻碍了自然科学的进步,我们不能忘记布鲁诺的惨剧,也不能忘记《乌托邦》的作者莫尔的悲哀;第一个喊出“知识就是力量”口号的哲学家培根,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特别要提出的是,培根还是法学家,当过英国的副检察长;笛卡儿,近代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毕业于普瓦泰大学法律系;17 世纪的科学巨匠牛顿,晚年致力于哲学研究,试图寻找第一动力,连做梦都思考着宇宙和自然的世界观问题;德国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在杜宾根大学攻读数学的同时,也研习神学和哲学;数学天才莱布尼兹少年时即大量阅读了古希腊罗马的著作,15 岁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一进校就跟上了大学二年级标准的人文学科课程,不仅如此,他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哲学也十分关注,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德国人;现代核物理的先驱爱因斯坦以及居里夫人晚年都致力于核能的和平使用,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量子化学大师鲍林晚年投身于世界和平事业,并获得了 1962 年诺贝尔和平奖;发明大师爱迪生在自学时,如饥似渴地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圣经》;1908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卢瑟福从新西兰坎特博雷学院毕业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和理学学士、硕士学位;我国物理学家黄昆 1948 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同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也是我国最早提出建设政治文明的学者。

四、发展综合优势是建造世界一流大学之基

世界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才的需求,竞相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和优化教育内容,由传统的单学科专才教育模式向多学科型的通才教育模式转变。其主要改革方向是促使学校结构综合化,即逐步改变原有的按单一学科独立建校的模式,将文、理、工等几大类学科纳入同一所学校。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从单一类大学发展为包括文、理、工等各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我国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高校

也从单纯的工科大学扩大为包括理、工、文在内的综合性大学。解决当今时代复杂、综合的系统性问题,单靠任何一门科学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把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4](p.47)},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总之,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高度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决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结合与协作的必然性,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走向一体化的实践基础和根源。

高等教育史表明,世界各国大学排名第一的大都是综合性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也都经历了一个由单科性、多科性到综合性的发展过程”^{[5](p.10)},这些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水平均居世界前列。例如,英国的剑桥大学可谓大师辈出,群星灿烂。其自然科学极具特色,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多达八十多人,仅在过去的八十余年里,剑桥大学就涌现出6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剑桥大学虽侧重于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其文科也同样名冠天下,英国的5位首相,20世纪的几位外国总理(如印度总理尼赫鲁、拉吉夫·甘地,马来西亚的拉赫曼总理,新加坡李光耀总理都是剑桥大学的校友)和大思想家兼哲学家培根、斯宾赛、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大科学家达尔文、哈维、麦克朗弗尔、卢瑟福,经济学家凯恩斯等都出于此,大诗人密尔顿、华兹华斯、拜伦也都毕业于剑桥大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和谐发展,促使剑桥大学各方英才、奇才脱颖而出,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剑桥大学所覆盖的学科属于理科性质的系、部有32个,属于文科性质的系和部有33个,比理科还多1个。哈佛大学当之无愧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是全美三千余所大学中的“王者之王”,这主要缘于哈佛执美国高等教育、学术科研之牛耳,拥有数不清的“第一”。它有着举世公认的学术口碑和崇高的国际声誉,在科技发展上,名符其实地走在了全美甚至全世界的最前列;它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制定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思想库,而且是各种学术流派和政治主张十分活跃的场所,共培养出6名美国总统、37名诺贝尔奖得主和30名普利策奖获得者,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性奖项、专业奖项获得者不计其数……哈佛大学本科生课程中的生物、化学、地质学、数学、物理、经济学、英文、历史、政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在全美大学中均排名前5名。哈佛大学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学生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哈佛有一套与大多数学校不同的教学方法,新生入校时,并不急于划分专业,而是从“五大核心课程”入手,先让学生们了解各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各学术领域形成初步认识,再根据每个人的兴趣确定专业方向。这五大核心课程是外国文化、历史学、文学与艺术、道德推理学(伦理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分析。设置“五大核心课程”的基本理念,是让每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不仅受到专业的学术训练,而且还要接受广泛的通识教育。再如日本东京大学由于多学院、多学科的特征,而成为历史悠久的世界著名大学。东京大学建校以来培养了大量知名人物,当代日本知名人士中,东京大学的毕业生约占半数以上,在科学家中就有长冈半太郎(后为大阪大学首任总长)、高木真治、近藤平三郎、小平邦彦、茅城司等知名学者。另外,东大被喻为“官僚的温床”,“总理首相人才的发生地”,“东大培养出来的人掌握着日本政治经济命脉”,这些说法从字面上看好像夸张了些,但事实确是如此。仅法学部的4万名毕业生中,就有2700人在官厅工作过。日本历任总理大臣中,从1921年到1945年,有1/3出自东大,而战后至今除了少数几位外,其余均由东大人包揽,包括内田原哉、宫泽喜一等。此外,历史学家井上清、经济学家大内兵卫也毕业于东京大学。在文艺方面,东京大学亦是人才辈出,大文豪川端康成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夏目漱石、森鸥外、永井荷风、广津柳浪等,都是世界闻名的作家。

目前,国内许多大学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那么,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世界一流大学?从世界一流大学排名来看,其中许多是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这是因为评定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中无不把哲学社会科学的贡献置于重要参考位置,如此标准的背后,又是因为历史上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两大学科的共同繁荣时期才成就的。在我国,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克

服文科教学研究与理工科教学研究两张皮现象,进一步加强两者之间的渗透与联合,建立起两者良性互动的机制,创造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相濡以沫、相激相励、共同发展的良好环境和平台,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可以说,不论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学院,还是后起的现代大学,都极其重视两大学科的和谐发展和齐头并进,决不会分离二者或是偏废某一方。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且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内涵正是基于哲学社会科学形成的大学人文环境和对人类文明、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夏禹龙. 科学学基础[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 [2] 万斌. 迈入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J]. 浙江社会科学,2001,(3):3-8.
- [3] 孟尔熹,丁乙,叶荫,等. 自然科学概论[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
- [4] 宋健.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 [5] 潘云鹤. 把握机遇,开拓创新,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3(4):10-14.

[责任编辑 何海峰]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LI Long, SHENG Peng

(Department of Law,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mbody the quality of a country, are connected with the prospects of a country's prosperity, a nation's survival and the success of its higher education.

Firstl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orm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 and are ess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 The advanced ideas and systems related to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constitute the basis for the modern country. They not only provide with the general plan for governing, but also cultivate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Secondl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mbody the essence of a nation. They form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s civilizati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can rectify the immoral action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s civilization.

Thirdly, the unity of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The relation between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s resembles the two wings of a bird or the two wheels of a vehicle. The two branches of sciences are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to improve the civilization for the mankind. The reason for the prestige of many scientists does not lie only in their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but also in their great moral quality, plus their excellent background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ourthly, seen from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fundamental task for the top-class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is to develop a combined superimacy of both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The top-class universities are mainly those who are advanced not only in natural sciences, but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Key word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atural science; value; status